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雨果评论汇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185.06
10

雨果评论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程曾真编

藏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雨果评论汇编

程曾厚 编选

责任编辑：林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庐江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

插 页：1

字 数：340,000

版 次：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729—7/I·653

定 价：10.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
主
编

问：冯 至

编：陈 槃

委：王佐良

刘 宁

吴元迈

李 芒

张 耳

郝铭鉴

郭家申

黄宝生

谭立德

季羨林

王道乾

刘硕良

陆梅林

李辉凡

张 玲

姚 见

夏 玫

绿 原

叶水夫

朱 虹

陈冰夷

杨周翰

张 黎

柳鸣九

夏仲翼

董衡巽

包文棣

吕同六

陈 槃

张 羽

余顺尧

袁可嘉

倪蕊琴

韩耀成

前言

1886年，雨果逝世的第二年，英国诗人斯温伯恩出版了一部细腻而热情的《雨果研究》。书前有一段比较：“1616年春，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与世长辞，没有公众的颂辞，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885年春，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法国人与世长辞，举国哀悼，痛为惋惜，情景同先前那位最伟大的诗人截然不同。”前者指莎士比亚，后者指雨果。斯温伯恩在莎士比亚逝世270年之后称他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已是历史结论，并非个人创见；在雨果逝世后马上说他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法国人，就远不是盖棺论定，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但是，莎士比亚无声无息地离世和雨果空前隆重的葬礼，形成强烈的对照，却是事实。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巴黎200万人参加，场面之壮观，空前绝后。一位作家身后如此哀荣，确为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所望尘莫及。不过，对雨果异乎寻常的尊敬和崇拜，并非始于逝世。在他80诞辰时，庆祝活动就如同国庆节，诗人居住的埃洛大街上搭起凯旋门，鲜花堆成小山，60万巴黎和外省的仰慕者在门前列队通过。

雨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高尔基称雨果是法兰西“荣誉桂冠上一颗熠熠生辉的钻石”。他的主要作品，不论是戏剧、小说或诗歌的发表，都是文坛乃至社会的重大事件。雨果少年时，即

被当时文坛霸主夏多布里昂称作“神童”；刚过二十，又被浪漫主义宿将诺迪埃评为“极富创见的天才”。“天才”这两个字，像影子似地紧紧跟随了雨果漫长的一生。莫洛亚的《雨果传》载，雨果80岁时，一天去上议院开会，议长向大会说：“天才出席了会议”。天才竟成了雨果的同义词。

法国和欧洲的评论家，为了说明雨果的成就和贡献，或把他和本国的古今大师作对照，或在欧洲文学更广阔的背景上，和古代的经典作家相比较。法国诗人拉马丁认为《悲惨世界》中对滑铁卢战场的描写胜过荷马史诗。在文学史家布吕纳介眼里，只有但丁可以和抒情诗人雨果相提并论。英国小说家F·特罗洛普曾为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如此丑化人类”，感到义愤填膺，并惊呼：“世上有一些糊涂虫”竟然相信他是“莎士比亚第二”。英国人轻易舍不得拿莎士比亚的名字与外国作家比较，但这位女作家的愤慨却从侧面告诉我们，雨果早在1836年，已被人比成“莎士比亚第二”。这样看来，雨果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理应得到评论界的一致公认，正如乔治·桑所指出的那样：“他占有的地位无人可以妒忌，事实上也无人敢于去占有，也无人提出异议，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可是“事实上”应该如此的情况，在现实中并非如此，而且远非如此。一方面，雨果一生受到的赞誉和颂扬，是别的作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在一些浪漫主义的战友或弟子之间，也不乏赞叹多于分析的溢美之辞。而另一方面，雨果一生受到的批评和攻击，又是任何其他作家所不曾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盛赞他的人格，欣赏他的作品，为之感动，为之惊叹；又有各种各样的人，抨击他的为人，憎恶他的作品，冷嘲热讽者有之，诋毁污蔑者更有之。对同一个作家，对同一部作品，在评价上如此两极分化的严重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本书入选的三十位法国作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对雨果持否定态度，其中不少意见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同样也应看到，有一些偏高的肯定评价，有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赞颂之辞，也未必是我们所同意的。

二

雨果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华，掌握高超的技巧。雨果的诗、文、剧作都有很高的成就，风格多姿多采，词汇之丰富，想象之出神入化，节奏之多变惊人，使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为之倾倒。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维克多·雨果诗句的音乐性适应了大自然深刻的和谐；他是雕塑家，他在他的诗节中勾勒出无法忘怀的事物形状；他是画家，他用事物本身固有的色彩使诗节熠熠生辉。正像这些诗节仿佛直接来自大自然，这三种印象也同时进入读者的脑海之中。”至于雨果的语言，他说：“法语词汇在从他嘴里吐出来时，就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色彩缤纷、富有旋律、变幻不定的天地。”英国诗人斯温伯恩对雨果的艺术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有对雨果的每一行诗，每一处停顿，每一个音符揣摩而再揣摩，才能领略他达到的高超境界。”

对雨果作品巨大的艺术价值和非凡的语言技巧，在他生前和身后，在国内和国外，历来有口皆碑，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就是这个明显的特点，也要加上“几乎”二字。因为这里也不无争议，例如在天主教报人路易·弗约笔下，雨果的诗歌不过是“词句、反衬和叠韵方面的游戏——他那个行当里不值一提的各种廉价玩意儿”。

三

雨果是以浪漫主义盟主的身份登上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崇

尚理想，善于抒情，在再现生活的创作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雨果，尤其是他前期的作品，正是浪漫主义手法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对雨果提出的批评之一，是认为雨果的作品不真实，虚假做作，缺乏感人的力量。

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对雨果的戏剧作品，包括《埃尔那尼》和《城堡卫戍官》，就持这样的看法。巴尔扎克认为《埃尔那尼》的“性格虚假，人物的行为违反常识”，剧情“就是一大堆罕见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和对理性的一种蔑视”。几十年以后，自然主义大师左拉又从同一立场出发，批评雨果的另一部名剧《吕依·布拉斯》。在左拉看来，该剧有“艺术虚构上的质量低劣的问题”，题材“离开了真实的事物的坚实土地”，只是“一堆令人厌恶的垃圾”。同样对于雨果的戏剧作品，创作手法属于浪漫主义的乔治·桑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她在第二次欣赏《吕克雷斯·博尔日亚》的演出后，激动之余，给雨果写信说：“您用无与伦比的、神奇的手法触及了、表达了最动人肺腑的感情。”她并且认为：“如果说《吕依·布拉斯》是成功的，引人注目的作品，那《吕克雷斯·博尔日亚》的构思则更加感人，更加扣人心弦，也更富人情味。”

晚年的歌德丝毫不能理解刚刚出版的浪漫主义杰作《巴黎圣母院》。他认为：小说里“男男女女都是一些没有生命的木偶”。英国小说家刘易斯也认为，《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尽是木偶，而且反复露出操纵手脚的绳儿”，结论是“我们惊讶，但不感动”。但是，英国第一本《雨果传》的作者马齐尔斯认为：“无论左拉先生赞同与否”，《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至今没有成为陈迹。这两本书中都有天才的盐分可保证它们永不腐败变质”。我们认为，对雨果作品真实性的批评，主要是一个创作方法的争论问题。一度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同古典

主义或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当然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在文学史上新旧更迭的时刻，还可能是针锋相对的。

四

雨果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不仅有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有巨大的社会内容，有很高的道德价值。雨果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称赞雨果的作品能“以最通俗的形式到处宣传未来的理想”。早在1828年，雨果就创作了抨击死刑的社会小说《死囚末日记》。1862年的《悲惨世界》则是这一条创作道路的顶峰。如果说，对雨果作品的艺术和手法有不同评价，这还是作家之间文学性质的讨论的话，关于雨果作品中思想和道德的争论，就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思想倾向不同的作家和评论家，对此都很敏感，不是作家和评论家的人对此也同样关注。雨果在文学上是爱憎分明的人道主义作家，在政治上是久经风雨的共和主义战士，他必然会受到很多人的拥护，也必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我们先以《悲惨世界》为例。波德莱尔指出在雨果的作品中，通常“道德不是作为目的而进入艺术之中”，诗人是“不想成为道德家的道德家”。但是《悲惨世界》却不如此，“道德是作为目的直接进入书中”，小说是“为‘悲惨世界’喊出的辩护词”。英国作家史蒂文森也认为，小说的“道德目的”“是使我們有所觉醒”，“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正是希望人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些现实；这一道德寓意和艺术技巧结合得天衣无缝。文明所给予下层人民的死一般的重荷也沉沉地压在我们读者的肩上”。

但是，正如诗人邦维尔所说，“世上没有一部杰作不引起无数的非难”。对《悲惨世界》这样一部优秀小说，连拉马丁也站

出来坚决反对：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骚动着的社会的泡沫和渣滓”，“雨果的书名是假的，他的人物不是悲惨的人，而是罪犯和懒汉”，《悲惨世界》是“流氓的史诗”。雨果对这种论点曾予以反驳：《悲惨世界》是“一本具有以博爱为基础，以进步为顶点的书”。雨果指出，拉马丁对社会革命代表了“温和的倾向”，而他自己则是“激进党人”。

再以《凶年集》为例。这部1872年发表的诗集的主题，是法国近代史上的两件大事：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雨果这部倾注了强热爱憎的重要作品，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颇为费解的是，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富于民主主义激情的乔治·桑竟然以尊敬而又激动的语言，倾吐了自己对《凶年集》的强烈不满。问题的要害仍然是书中的思想内容和社会观点，关键是雨果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女小说家对凡尔赛政府并无好感，但对巴黎公社抱有偏见。乔治·桑责怪诗人没有“清醒的头脑”，陷入“变色的棱镜而不能自拔”，竟然为“野蛮纵火”的“残暴的匪徒”辩解。她断言雨果“站在天平一边的盘子里是个错误，再压上天才、功绩和荣誉的全部份量，则错误就更加严重”。拉马丁对《悲惨世界》的批评，乔治·桑对《凶年集》的批评，都是意味深长的。

五

雨果30年代在长诗《诗人的职责》中，就提出诗人应是“先知”，追求理想，“脚站在此地，眼望着远方”。诗人40年代一度从政，有过一些曲折。俄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说：“1851年12月2日，他像巨人般站立起来了。”第二帝国建立后，他在政治上已从自由主义者成长为受到世界大同理想鼓舞的共和主义者，思想的视野更开阔，思想的境界更高远，他创作了不少哲理诗，在诗中常以“沉思者”自居。同辈的大仲马在评论《心声集》时

就认为：“维克多·雨果不仅是大诗人，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

但是，雨果作品中有没有思想，雨果是不是思想家，对某些人却成为问题，这既出于误解，也由于敌意。拉马丁说：“所谓‘社会主义者’的作家，他们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用贫乏的头脑思考。”权威的批评家朗松的看法更为直率：“雨果没有新颖的思想……他没有清晰的思想，因为他是诗人，不是哲学家。”这些批评家无视雨果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容，而是咬文嚼字，要寻找纯思辨性的哲学体系，并因而感到失望。

法国哲学家勒努维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肯定的结论，客观上解决了这个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朗松读后对自己原有的看法有所动摇，并在其《法国文学史》(第十七版)里特意加注说明：“勒努维耶赞赏雨果能如此得心应手地找到形象，用以表达哲学家的抽象概念。”

六

联系到雨果的具体创作，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起这样褒我贬、一正一反的对立评价。浪漫主义的宣言书《〈克伦威尔〉序言》在戈蒂耶看来，“仿佛是照亮西奈山的摩西十诫，在我们眼前放出熠熠光芒”；而左拉认为“《克伦威尔》的序言本身就令人发笑”。对《埃尔那尼》，巴尔扎克断言是“虚伪的成功”，而且还是“仿制品”；而都德却认为是“我们所看到的最辉煌、最感人的剧本之一”。

对雨果作品的评价是如此，对雨果本人的评价也是如此。海涅就称雨果是“利己主义者”，是“放肆和厚颜无耻”的“暴发户”；朗松受到诋毁雨果的传记家比雷的影响，也曾认为“这是位伟大的艺术家，灵魂里却市侩习气很浓”，还有“过分的利己

主义”。斯温伯恩的评价截然相反：“如此伟大的诗人又如此善良，如此善良的人物又具备如此伟大的天赋，我们不知另有这样的第二人。”

路易·弗约骂诗人讲的是“社会主义的蠢话”，说雨果“要给世界放上一把火来沽名钓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法格也不能理解雨果，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在“雨果身上发现本阶级的本能、热情和思想的最完整最出色的人身化之一例”，雨果崇拜“私产上帝”，雨果的“一切都是广告”。雨果逝世后，两位政治立场对立的人谈起诗人盛大的葬礼时，反而是“殊途同归”，拉法格称作是“迎神赛会式的游行”，欧仁·弗约讥之为“一场滑稽表现”。法语中有两个词源相同而词义相对的词，一个是hugophilie，意思是“奉承雨果”，另一个是hugophobie，意思是“仇视雨果”。这两个词的存在从语言上反映了对雨果评价两极分化的严重现象，而这是任何法国作家所没有的。

关于上述种种复杂而矛盾的现象，我们认为，或是从艺术上，或是从政治上，都是可以理解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有一段文字，反映了评论界矛盾的状况：“不推崇他为戏剧诗人的人，承认他是小说家，不喜爱他的小说的人，欣赏他的抒情诗。厌恶他的文学趣味的人接受他的思想；攻击他的思想的人热衷他的形式。”雨果是个包罗万象的巨人，在他多姿多采的天才中，具有让任何评论家感到叹服的东西。至于弗约兄弟和拉法格对雨果的全盘否定，一右一左，可以说是极个别的例外，并无代表性可言。弗约兄弟的评价是反面材料，拉法格的想法也有待商榷。

七

1830年《埃尔那尼》的上演，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决战，史称“埃尔那尼战役”。在雨果漫长的一生中，对他本人，

尤其是对他的作品，一直展开着一场肯定或否定的论争，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持久的“雨果战役”呢？“雨果战役”的胜负既取决于评论界，但又不完全取决于评论界。决定雨果命运的，还有一位没有声音、却有力量的法官。这位法官似乎站在论争之外，其实对论争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广大默默无闻的读者，这就是无数的普通劳动者，这就是喜爱雨果作品的法兰西人民。他们阅读雨果的作品，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意见，他们没有撰写文章，没有发表评论。但是，他们是存在的。左拉有一篇文章，原意想告诉我们法国人民并不理解雨果，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生动的材料，客观证明了法国人民对雨果的深厚感情：“平民百姓购买他的著作的普及本，买了十万本之多。……当维克多·雨果的这些作品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售价为十生丁的时候，我知道有些工人戒掉了烟来购买。”

在雨果生前，已经有一些人对雨果一生的创作和思想，试图作出全面的评价。从1885年雨果逝世至1902年诗人诞辰100周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内，雨果崇高的历史地位进一步确立，这是评论界总的趋势。此外，还开始出现了专题的研究和系统的评价。前者可以举出布吕纳介在《法国19世纪抒情诗的演变》中对雨果诗歌的研究，以及勒努维耶在《哲学家雨果》中对雨果哲学思想的研究；后者可以举出英国斯温伯恩的《雨果研究》和法国格雷格的《雨果研究》。

朗松的《法国文学史》是19世纪法国学院派文学评论的经典著作，当时和后世都有影响。朗松尽管轻视雨果的为人，但他对艺术特点的分析还是公允的。他认为，雨果在1850年前，“已经成为一位大师”，但还“在摸索，在寻找他的道路”。1850年以

后，他“接受了共和及民主思想。这样，他抓住了他所需要的灵感，才能保持他的想象力，并成为三十年间一个民族的偶像”。朗松还指出：“他的诗歌表达了一个人的种种激情，然而又是普天之下的激情。这就赋予他的作品以伟大的崇高的气像”。

法国诗人格雷格看到雨果作品中“存在着压倒一切否定意见的某种现实，这就是大量的人道主义力量和永恒的美感”。他认为雨果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总之，他是伟大诗人的同时，还是人类一颗十分崇高的良心。”

九

雨果很早就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作家。19世纪后半期，他在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许多英美作家既承认雨果的诗歌天才，也看到他小说和戏剧的成就。圣茨伯里认为：“维克多·雨果在后世眼里将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法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之一。”马修斯充分肯定雨果作品的思想价值：“他的最杰出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他的最优秀的部分越出文学，进入生活。……超过和高于天才的，是雨果伟大的心灵。”马齐尔斯更强调雨果的文学成就：“缺少这一笔财富，人类将比现在贫乏。”

切斯特顿在雨果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文章里有这样的总结：“维克多·雨果代表两个革命，其一是艺术的革命，其二是政治的革命。艺术的革命与浪漫主义一词相关联，政治的革命与民主一词相关联。”正是这样，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作家，会在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掀起一场政治革命的思想家，会在历史上有自己的地位。只有既掀起文学革命、又掀起政治革命的作家，才能既在文学史上和历史上，又在人民心里，有自己的地位。这样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的，而雨果肯定是其中之一。

雨果勤奋创作，勇于创新，一生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正像大仲马所说：“如同那些相信自己的罗马帝国永恒不朽的老人，用大理石和花岗岩建造自己宏伟的纪念堂，他把纪念堂的基础深深地扎根地下，让纪念堂的巨塔高高地直指天空。然后，他对自己赋予力量、许以生命的建筑材料充满信心，放心地把建筑物放下，一任烈日雷电和狂风暴雨的考验。”雨果这位辛勤的建筑大师，为人类建造了一座其大无比的文学殿堂，一任世人和后辈指点批评。罗曼·罗兰在1935年雨果逝世50周年纪念时说得好：“有多少评判过他的活人已经死了，而他死后却还活着，还在‘变化’着！有人否定他，有人激烈讨论他，只是证明他的存在。不论是诋毁他，也不论是颂扬他，雨果不会、将永远不会得到‘休息’！”

十

雨果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法国作家。给这样重要的作家编选研究资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法国至今也没有出版过同类型的研究资料汇编。但是，有意义的工作有时偏偏又有很多困难。

首先是迄今为止，雨果在我国读者心目中主要是一个小说家。他的五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都已译成中文，《巴黎圣母院》和《笑面人》还不止一种中译本。可是正如史蒂文森所说的，这五部小说“不过是雨果为自己的天才所树立的丰碑的一个侧面”。雨果主要是一个诗人，而他的诗歌只是最近才在我国有比较认真的介绍。从总体上说，雨果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都很薄弱。本书编者在其翻译的《雨果诗选》的前言中说过：“雨果是一个有待我们去发现的诗人。”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对材料的选择上作了相应的安排。我们

在介绍雨果小说材料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篇幅放在诗歌上。对于雨果的戏剧创作，我们也给以一定的比例，尤其围绕《埃尔那尼》一剧，集中了较多的研究材料，以反映不同作家的观点和不同时期的评价。

雨果是积极介入时代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家，还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政论作品。这是一份研究雨果思想和创作的重要材料，也是一份研究法国和欧洲历史的珍贵史料。我国对《言行录》、《见闻录》等著作迄今尚未介绍，本书限于篇幅，也只收录路易·弗约的两篇新闻报道，希望研究者透过这小小的窗口，可以窥见雨果政论作品蕴含的巨大内容。雨果一生创作的二、三千幅很有特色，甚至令人迷惑不解的绘画作品，也应该是雨果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诗人兼画家戈蒂耶为此写过研究文章。考虑到雨果的画作在19世纪还没有引起评论界的普遍重视，本书暂不介绍有关材料。

编选工作的又一个困难，是现有研究资料的严重匮乏。已译成中文的材料，只有拉法格的《雨果传说》和巴尔扎克的两三篇文字，不仅数量少，内容上也有局限性。法语文献，大多有目无书，难以搜罗。法语以外其他语种的资料，更是一片空白。编选工作应该是在积累和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原则、目的和方法，加以筛选。而我们的编选工作却不得不把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搜集材料上。

本书的内容十分之九是过去从未介绍过的材料。就法国部分而言，我们最终能找到拉马丁评《悲惨世界》和乔治·桑评《凶年集》等若干文章，也是编选前未曾料及的收获。但也有一些重要评论，如勒努维耶的《哲学家雨果》，虽经寻觅，终难罗致。我们希望本书的法国部分没有很多重大的遗漏。

英美作家由于文化、语言、地理等原因，介绍雨果相当及时，

英国《新杂志月刊》早在1822年就载文评论雨果了。他们之中虽然个别评价偏高，但大体上说介绍和评论并重，立场比较客观，持论比较严谨，某些意见还相当精彩。我们自信，就19世纪英美的雨果评论而言，本书对重要专著和文章的收录还算差强人意。与此相反，俄国部分雨果评论数量不足。沙皇政府十分害怕雨果，诗人每有新作问世，俄国的检查机关即通令禁止翻译。1834年下令禁译《巴黎圣母院》，小说的俄译本40年后始与读者见面。《玛丽蓉·德·洛尔墨》的禁译命令竟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下达的。尽管俄文方面的译者为查阅材料化费不少时间，但限于客观条件，目前选收的大都只是片断。德语部分我们仅收录歌德和海涅两家，虽有代表性，但并不完整。歌德长雨果50余岁，他晚年在书信及谈话中仅提到雨果初期的两三部作品。海涅的评论限于40年代以前，没有涉及雨果主要的创作阶段。

本书所收的材料，暂以1914年为下限。材料的编次以国别为经，再按作者生卒年月先后为序。《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所出各书一般按文章的发表年月顺序，但本书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查不到发表日期，所以只好破例。

本书的完成和各方面的协助是分不开的。我们的工作得到《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的热情支持，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编者也感谢各位译者的通力合作，他们如果没有认真译校的责任感，这一类节录文字较多、文字处理困难的评论文章是不易译好的。

由于编者掌握材料不够，编选工作又乏经验，讹误和疏漏一定不少，竭诚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帮助我们修正错误，改进工作。

程曾厚1988年2月记于南京斗室，7月改于锁金村。